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本章主要对书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和产业合作的基本理论进行阐述,构建产业合作的方法论体系。

第一节 产业合作的相关概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国为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产品市场,配置优势资源,国际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和发展,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欧盟国家和北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他真正意义上成功的一体化范例并不多见。可能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本质上说,缺乏产业方面的深入合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产业合作当然也是国与国之间、区域经济体之间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产业合作不仅仅是三大产业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同时也是贸易、资金、投资与专业技术的全方面合作,以及政府、企业、非经济组织和相关辅助机构的合作。产业合作的目标应该是在指定区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完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吕洪良,2005)。

为深入分析目前国际产业合作的研究进展,本节首先对产业合作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总结。

一、产业的概念界定

产业的概念由来已久,国内外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经典文献均对其做出了解释。一般认为,产业是指具有相同经济属性或经济特征的企业及其相关活动的集合。从人类经济发展史来看,产业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和相互协作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产业是生产分工和协作发展的结果。

产业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步是社会化作业分工发展进步的产物。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最终结果,而分工的发展进步又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与新产业的产生。根据恩格斯的观点,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分工^①:第一次发生在原始社会后期,一方面,身为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一些族群开始驯养动物并扩大畜群,逐渐由野蛮人向从事畜牧业的游牧部落转变;另一方面,随着原始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提升,出现了犁、织布机等生产工具,形成了以大面积种植谷物为目的的农耕部落,畜牧业和农业实现分离。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许多剩余产品,部落间的产品交换日益频繁。

第二次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可以看作是第一次分工的高级阶段。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青铜器和铁器等工具得到大范围应用,商品生产的规模和商品交换的范围均迅速扩张。以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开始出现,第一次社会分工零星出现的奴隶制萌芽,在这一阶段已经成为社会制度的主流。

第三次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瓦解,正步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出现了金属货币,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阶级逐渐形成。这次社会分工逐渐确立了奴隶从事体力劳动,而其他完全脱离

^① Engels, Friedrich,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M].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902.

体力劳动,专门从事监督生产、管理国家及科学、艺术等活动。财富逐渐向少部分人手里集中,阶级对立开始出现。

另外,产业发展也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互作用和促进,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而商品经济的不断成熟,也使得人们对进一步社会分工的要求越来越急切,进一步推动新的专业化部门的形成。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具有新特点、新形式的产业部门也会持续涌现出来(韩微,2007)。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技术不断创新和更新迭代,全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产工艺、全新物质材料、全新科技产品不断涌现,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加工和社会分工进入全新的行业领域,也为新产业部门的诞生提供了基本条件。化学合成、原子能、电子和互联网等技术的发明、发展和不断成熟,逐渐实现了工业化的生产应用,使得电子信息、机器人、激光、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生物工程、原子能、新型材料等一系列产业不断地被细分出来。例如,自动智能化控制管理与加工制造计算机的专业技术发明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就推动了专业生产加工电子自动智能化控制管理与加工制造计算机产业部门的产生(李悦,2008)。最近几年,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高科技的发展也催生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壮大。无数的实践结果证明,科学专业技术的进步和技术创新的能力,正在促进现有产业部门的不断分化以及新的产业部门的形成和发展。

二、产业的国际竞争

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国之间快速流动,产业在世界各国国内和国际经济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人们普遍认为,产业是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研究的重点,它将国际贸易投资、国家和各级各类企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早期,学者更多的是在一国范围之内来界定产业。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产业的概念和范畴也超越国界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概念,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也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如何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人们的持续关注。产业是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企业的国际竞争、国家之间竞争的中间层次。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解释为某个国家产业及其各个产业领域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或者说是同一个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中,不同国家的相对实力。纵观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关于竞争的讨论基础上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曾提出^①,和产业发展进步有关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四时期,依次是生产加工基本要素导向时期、投资导向时期、改革创新导向时期与富裕导向时期。市场竞争先手优势的连续力取决于三项重要基本条件:第一,独特资源的功能优势;第二,市场竞争先手优势的类型和数目;第三,市场竞争先手优势的连续力。市场竞争先手优势要求持续的完善与自我提高。产业不仅要维持某些市场的竞争先手优势,同时也要依靠关键基本要素的交流互动,不断加强,才可以产生其他国家很难仿照的产业环境。在国家优势方面,创建完整的产业系统,远远比产业的局限片面表现重要。^②

国际贸易是产业合作与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而贸易竞争指数(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ex, TCI)是衡量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贸易竞争指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即一个国家某一类产品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差额除以进出口总额的商。当该指数为正值时,说明该类产品在国际市场更加受到欢迎;当指数为负值时,表示该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除国际贸易外,一个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国内企业向外国投资的能力,以及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的能力,也是产业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把一个国家特定产业范围内的所有企业竞争力集合起来,就形成了产业竞争力,它是企业如何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和目标区域,从而有效地从国际市场获取外部经济资源并在国内利用的能力,也体现了本国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掌控和配置该产业发展前沿

^①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②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李明轩、邱如美,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的技术、市场和其他经济资源的能力。

研究产业国际竞争时,需要注意它的几点特征。第一,产业竞争发生于经济行为的所有环节。产业竞争在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劳务的输出和输入,技术的引进和转让,以及资本的输入和输出等国际经济技术活动的所有环节都普遍存在,因此,贸易竞争、投资竞争、资本竞争、技术竞争等多种竞争形式均属于产业国际竞争的范畴。第二,产业竞争具有双向性,特定产业中的各类生产要素,既可以从国内流动到国外,同时也可以从国外引入。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商品、输出劳务、出口技术和境外投资等方式,体现自身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反之也可以通过引入的方式,来提高国内对应产业的水平,也是增强竞争力的另一种表现。第三,产业竞争具有综合性。一个国家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是这个国家该产业范围内全部企业的竞争力综合而成的,每个企业单独开展国际竞争活动,会受到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但一个国家某一产业的竞争力并不能简单视为该产业范围内所有企业个体竞争力的叠加,企业特别是多元化经营企业的经营范围通常会跨越多个产业的边界,所以产业内所有企业叠加的边界不等于产业的边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有企业个体竞争力融合转化为产业综合的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协同提升过程。第四,产业竞争具有选择性。所有国家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所有产业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领先,也很难做到在产业内各方面同时都相对于竞争者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各国不约而同地努力实现核心技术水平最高,市场前景最广阔,同时将本国优势最强的产业放在未来发展的核心,并集中力量来提高竞争力。同时在表现一般或处于弱势地位的产业中,采取维持、防御或撤退的战略,来换取明星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最终实现这些产品在该产业链中占据技术的前沿。

产业竞争力是相关企业产品竞争力的集合,在当今世界的市场体制下,任何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都是具体产品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一般来说是通过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来衡量,但仅考虑个别产品竞争力则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从产业所有产品的角度分析,其中技术水平较高、发展潜力大、受市场追捧的产品数量和种类越多,市场占有份额越高,相应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就



越高。因此,由于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不同层次的产品所占市场份额就存在差异,这也代表了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发展水平。

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中的实际参与者,是一个国家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实际载体。各类生产要素、市场机会、产业规模、软性作用力、外部关系的影响等因素与产品的竞争力密切相关,最终反映在企业的相对地位上。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和成长发展,对整个产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发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集中度很高的产业,资源基本被领先的一家或几家大型企业占据,它们的市场竞争力可以近似代表产业的竞争力。反过来在集中度较低产业,其市场竞争力体现在这个产业里的每一个企业所产生的综合市场竞争力。产业市场竞争力并非是一个企业个体市场竞争力的简单加和,它可能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除此之外,很多企业都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因此产业市场竞争力就更不可以由上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简易加总而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的未来取决于产品的竞争力,产业的未来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

三、产业分工

(一) 国内产业分工

产业结构由产业内的分工和产业间的分工组成。从产业间的分工来看,全部经济活动分为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三大产业,即为产业间分工。三大产业内部进一步细分为许多具体的不同产业和部门,从而形成产业内的分工。在研究国内产业分工时,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并且是否能够实现不断优化和提升。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将不断演进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协调管理、优化提高的基础之上,其综合水平与收益会持续向更高水准发展进化。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能力一一对应,并且持续变化。这类变化主要表现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产业结构在产业实际高度方面持续地从

低级向高级演变,在产业结构水平方向联系方面,持续由简易化向庞杂化演变,这两个层面的演变持续地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效化方向发展进步。从全球各个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真实状况分析看,产业结构的转化是有基础规律可循的。

产业结构提升与演变的内在基本规律是:(1)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较低人均收入水平时,其产业结构的特点是初级产品及传统日常生活消费类产品的生产加工比例较大,其市场贸易分布体现为自动输出初级产品及传统日常生活消费类产品,自动输入普通生产加工机器设备的中间产品。这是一个初级产品大规模生产加工的发展时期,是一个经济低速增长的时期,第一产业生产加工活动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2)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接近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转化的临界点时,传统日常生活消费类产品的生产加工比例快速降低,机械设施、金属材料等制造加工产业比例提高,自动输出产品转为日常生活消费制成品,自动输入生产加工机器设备的高级中间产品。这是一个现代工业化时期,其重要特点是经济核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加工转为制造加工产业产品的生产加工,资产累积对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重大贡献较多。(3)当人均收入水平超越临界点之后,产业结构全面进入高级化时期(或发达经济时期),其特点是高专业技术第二产业部门发展,地区的生产加工重点转为石油、复合材料、重型机械设备、精密机械设备、多种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类产品与高专业技术产品,自动输出的产品转为生产加工物质资料、耐用消费类产品与高专业技术产品,自动输入产品转为初级产品。

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提高,是市场与政府两个层面同时发挥作用的最终结果,政府的产业政策起到非常关键的影响。

国家产业政策具体又可以划分为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等。

产业结构政策是政府根据产业结构的发展基本规律与一定时期内的变化态势,制定的相关产业部门相互之间资源配置组合模式、产业间及产业部门间比重相互关系协调管理方式,以推动产业结构向协调化和高度化方向发展的国家政策总和。产业结构政策的中心,是在推动产业结构协调化的同



时,提升产业结构转换水平,进而推进产业结构在合乎基本规律的转换中提升速率、提高收益。产业结构政策的发展目标,是在市场体制调节基础上,通过政府应用多种必要方式与措施,对过剩产能实施有序退出、对战略产业实施保护、对主导产业展开准确选择、对新技术行业实施扶植,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推动发展目标的实现。

产业组织指的是产业市场中各主体的构成及其相互联系,以及这些主体所涉及的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产业组织理论则主要研究产业内部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市场表现,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如何通过政策实现产业资源的高效组织。产业组织政策是政府为了提升产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全面调整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并推动产业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国家管理措施。其目的主要是在产业内部营造一个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通过竞争激励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提升产业的总体收益,重点关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①两个层面。产业政策通常包括反垄断政策、兼并重组政策、中小企业政策以及促进公平市场竞争的政策等。

产业布局涉及对产业在空间维度上的系统性规划,即决策特定产业部门应定位于哪些具体的地理位置。产业布局可被视为政府对产业空间演化的一种干预行为。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成为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力量。由于产业分布是企业分布决策的宏观体现,企业作为影响产业分布的关键行为者,其分布决策通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在制定分布策略时,会依据市场价格信号和价值规律来指导其决策过程。

(二) 国际产业分工

从世界范围内看,全球产业分工经历了一个持续改变的发展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发达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分工的基本方式是垂直

^① 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生产单一产品时,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下降的现象,主要通过固定成本分摊和专业化分工实现成本优势。范围经济则是指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通过资源共享和技术互补等手段降低单位成本,实现成本优势。简言之,规模经济强调单一产品产量增加带来的成本效益,范围经济则强调多产品共存带来的协同成本优势。

国际分工(vertical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加工与对外出口第二产业产品,不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加工与对外出口农产品及矿产品。由于原材料与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明显,后者一般要比前者高出很多倍,因此在全球开展产品交换,是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一般来讲,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专业技术优势剥削奴役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工艺技术水平落后,没有能力生产能出口的产品,被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长期压制,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难以改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发达国家的制造加工产业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大型国际企业的崛起、道路交通运输与通信业的强大进步,全球市场贸易快速扩增,并日益全球化。在这类全球化态势下,产生了和垂直分工并存的综合水平分工(vertical-level mixed industrial division)。过去的纯原材料、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国与对外出口国,愈来愈多地被迫生产加工与对外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与此同时又要被生产加工与对外出口成品的国家代替,只不过不同国家所生产加工与对外出口成品的比例不同罢了。即使在现今,发达西方国家所生产加工与对外出口的大部分依然是成品,但是从全球整体分布局面分析看,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产业布局逐渐呈现出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局面。同时,欠发达国家在产成品加工和出口方面也显示出稳步增长的态势。

四、产业合作

产业竞争的对立面为产业合作,两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在一个国家内部,三大产业各自分工明确,但又在某种程度上紧密联系,只有相互配合,优化资源配置,才能保持国家经济的平稳运转。在国际范围内,产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是承载所有企业的集合。如前文所述,产业合作是国家合作和企业合作的中间环节,在两者之间起到关键的承上启下作用。与产业分工类似,产业合作也可以分为国内产业合作和国际产业合作两方面,其中合



作博弈中的战略联盟已成为国内和国际产业合作的重要形式。

（一）国内产业合作

国内产业合作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各产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产业共同体。各产业之间,包括三大产业之间、传统产业与新兴技术产业之间,都需要相互合作。在当前的实践中,国内产业合作日益通过经济规划区的方式来实现,即将一个国家划分为多个经济规划区,每个经济规划区相当于一个产业合作区。一个完整的经济规划区系统,是在各产业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各产业的相互作用和联系构成了产业排布序列。产业排布序列指的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中,基础产业、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布局关系。在当代社会经济中,基础产业为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主导产业的成熟稳定,又为基础产业提供了新兴专业技术与装备,从而推动基础产业的不断升级与演化。这一产业排布序列具有明确的层次结构,有助于直观地判断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并产生深远的实际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边界的不断扩大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一国范围内不同产业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并逐渐形成如产业聚集、产业集群这种产业之间合作的新形态。一个区域长时间在某一产业具备优势,优势产业持续增加并且逐渐发展成为这个区域的经济核心支柱,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和产业发展进步高效融合,形成了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经济区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未必来自某一产业或者某几个产业的成功,而是源自众多互相连接密不可分的产业集群。国家整体的经济是通过多种产业集群所构成,上述产业集群补偿并且产生市场竞争先手优势,自然也能够产生市场竞争劣势。

产业聚集地区互联网体系是建立在中心产业、辅助产业及其内部各公司之间相互联系的基础上,涵盖了公司、科研机构 and 行政组织之间长期合作的稳定关系。这一体系通过交易市场、交易组织和公司层级之间的综合管理方式进行组织,具有相对稳定的交易市场和灵活多样的组织功能优势,因此该

网络结构被称为“有组织的交易市场、可调配的公司”。在产业聚集区,各产业和公司之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相互关系。英国学者马丁·克里斯多夫(Martin Christopher)指出:“交易市场仅提供产业链,而没有公司。”他进一步提出:“21 世纪的市场竞争不再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产业链提供者之间的竞争。”

产业聚集的本质因素是,集聚作用能够给地区内部的公司创造较大的投资回报,资源禀赋是产业聚集产生的最初诱导原因。高效、全面、充分利用各地区的天然矿物资源优势发展经济,是产生产业聚集的原始推动力。随着科学技术在产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也逐渐兴起。我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各地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园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二) 国际产业合作与产业竞争

国际产业合作的目的是促进区域内国家的生产要素在特定的区域聚集,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使得区域整体竞争力得以提升,最终带动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具有竞争优势。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人力、资源、技术等要素都存在差异,没有国家能在所有产业中都具有绝对优势,能够依靠自身就实现经济发展的内部循环,完全不需要与其他国家在产品、资金、服务和技术等方面发生联系。国际产业合作的最优策略在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重点投资于具有最高生产效率和最大发展潜力的地区与领域。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企业能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选择最适宜的地域聚集,从而实现“用脚投票”。最终,产业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动向具备较强发展优势的区域集中。

在国际产业合作中,思考以下三个问题至关重要。第一,产业的总规模或单一产业中的主体公司是否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第二,产业内部是否存在科学合理的生产加工层级结构,即各公司生产加工规模是否符合优化要求。第三,产业内部的关联性。某些产业从科学角度进行分析,将逐步发展



为系统性产业。这类产业通常具备足够大的交易市场规模和完整的产品链。通过系统化的经营管理,这些产业能够获得更大的效益,相比于其他非系统化的产业布局(如独立生产、分阶段加工、配套供应和技术合作等),系统化经营方式能够更有效地整合资源,提升整体效益。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国际产业合作主要是通过产业开放和产业竞争表现出来。产业开放的含义主要包含:(1)该产业的多种产品交易市场对外开放,允许欧美等同类产品全面进入并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形成全球化的产品市场;(2)这个产业的每一个公司所有权交易市场对外开放,允许欧美资金全面进入全国资本交易市场,形成全球所有权市场竞争;(3)本国的国有企业跨出国门,到国外开展跨国经营管理,从而在全球资本交易市场上吸收资产和各生产加工基本要素,进行全球基本要素市场竞争;(4)允许早已在产业里大力发挥作用的专业人才跨国流动,吸收欧美发达国家同产业的专业人才在国内任职。

当然,国际产业合作主要包含全球范围的产业合作与地区范围的产业合作两大方式。全球化与地区化作为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态势,产业合作也能够在这两个层次上开展。发达西方国家在三大产业中普遍较为成熟且稳定,因此其产业合作往往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展开。凭借区位优势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发达西方国家在多个地区积极开展产业合作。欧盟与美国、加拿大等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相比之下,不发达国家在这两个层面的合作水平仍然较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平等合作,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许多矛盾和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开展地区性产业合作通常是对不发达国家而言更为可行的选择。

以往的文献认为,在市场制度和产业合作模式都不发达的环境中,产业合作更难以采取超出其直接经济利益的行动,因此它们可能成为产业合作在新兴市场中做出社会反应的重要刺激因素。在这些市场中,他们对超出直接经济利益的行为的制度压力相对较弱。跨国产业合作中社会响应的变化,是运动策略与产业合作所带来的政治机会结构变化的结果。过去十年中,在线

激进主义逐渐兴起,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发声、教育普及、组织动员和推动变革,已经成为一种新兴方式。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社会运动组织和其他更有组织的行动主义形式(如抗议和集会)是政府禁止的。组织的脆弱性以及产业合作本国的制度逻辑与运动要求之间的一致性产业获得合作的重要政治机会。组织脆弱感会促使产业合作满足要求,因为受制裁的威胁对产业合作来说似乎更有威慑力。如果是产业合作者的活动要求与产业合作本国的制度逻辑一致,他们将被视为具有更大的合法性,从而减少产业合作抵制,做出更快的反应。此外,竞选所施加的压力及其主张的合法性,会对公司反应的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二节 产业合作的理论基础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跨区域产业合作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跨国产业合作模式,首先需要探讨哪些因素影响经济行为,进而影响跨国产业合作的结果。有三种关键因素值得关注。一是社会网络。经济行为往往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因此,经济结果会受到社会网络属性的影响。这一观点不仅涉及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优劣,还引入了“行动者网络理论”^①。该理论强调网络中人与物的不可分割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网络力量,将行动者、组织文化和环境等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Callon, 1991),从而对跨国产业合作的经济结果产生深远影响。二是经济主体的创

^①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等人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主要用于理解科技、社会和经济现象中的行动者(actors)及其网络。该理论特别强调在社会和技术实践中的“行动者”不仅是人类,也包括非人类元素(如技术、物品、制度等),并且这些行动者通过相互作用和连接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



新、学习和适应能力对于其在网络中的表现也具有重要影响。与传统经济学中假设的完全理性不同,这一因素强调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其战略决策、行动以及最终的结果。三是,经济是一种制度化的形成过程,通过群体力量持续塑造。这一过程既不是机械的系统化,也非特定群体偏好的简单体现。这种群体的力量包含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集合,也包括个体习惯、群体惯例、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不确定性和知识有限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制度具有稳定性,人们在制度的限定范围内获得共识,并指导国家间的产业合作行为。因此,从管理角度看,跨国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都需要通过寻求政策来改变经济轨迹。由此可见,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都对市场和国家间的机构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其产业合作等经济活动。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与其相关的基本概念及管理原则逐渐被渗透到跨国区域发展的研究中,产生了新的制度转变及政策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区域”被认为是全球政治经济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Cooke,1997)。尤其是在领土临近的经济组织中,高度活跃的区域经济和基于地区资产的产业分支成为竞争优势中的重要因素。这又可以延伸到内生增长理论,它认为规模收益的增加和专业化相关的经济性来源之一是空间聚集(Porter,1994; Krugman,1996)。专门从事特定产业及其上下游联系的地方受益于规模经济和与专业化相关的优势,这些从跨国产业合作模式中都能找到相应体现。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跨越地理空间的产业合作中使得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减少、回报增加、产业间专门知识交换增多,以及技能技术有所进步。跨国产业合作同样受益于制度的进步,使得国家间的关联性和邻近性增强,并基于互惠和信任的关系,促进了国家间的知识流通和经验推广(Amin and Thrift,1995; Sunley,1996; Storper,1997)。基于制度调整过程中学习环境的变化,区域产业合作在创造竞争优势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局限性(Amin & Cohendet,1999)。例如,隐性知识的流通受限,以及双方国家博弈机制对合作效果的影响等。

二、基于共生理论的国际跨区域产业合作

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作为典型的跨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我们可以从区域经济的理论视野出发对其进行探究。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国家间在自然资源、社会文化和生产要素水平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区域具有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张丽君、郑妍(2014)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进行跨境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客观要求,并提出了我国跨境经济合作的实施策略。姜永铭(2009)提出的三大区域空间理论,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国际经济与产业合作的基本框架,并重点剖析了欧盟、北美和东亚典型国家和经济体在跨境经济及产业合作中如何选择其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互惠合作。基于区域经济理论的视角,已有的文献探讨了影响跨境经济合作的主要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转移成本(Blatter, 2000; Hanson, 2001)。也有学者以东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将跨境经济合作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双方建立特殊合作通道的模式、建立贸易口岸的模式和通过设立开发区进行跨境经济合作的模式(汤建中, 张兵, 陈瑛, 2002)。中国与东盟的合作随着国家间地理空间的拓展逐渐增多,进一步扩大了产业合作的发展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

共生理论指出,共生关系是自然与人类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人类社会与自然如果想达到共生,必然需要互惠互利,这也是共生关系的终极目标。同样,这样互利的关系是开展跨区域经济与产业合作的战略基础,是各国开展合作的前提。冷志明、张合平(2007)发现,基于共生理论研究解决区域经济问题,对形成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及目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研究的问题与理论也保持了一致性。已有研究将“共生理论”嵌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东北亚地区的合作。衣保中、张洁妍(2015)提出应建立共生机制,创新合作模式,东北亚地区的发展应该深化系统平台,加强全区域内的互动合作升级。

纵观共生理论研究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学者更多地关注区域经济合



作,而对跨境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很少,也很少关注国家间的跨区域产业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涉及多个经济实体。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合作方式,同样可以运用共生理论进行分析,从而推动制度转变及国际产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产业转移理论

在全球化进程中,一国企业将其生产环节的某一部分或全部转移到他国的过程被定义为产业转移。这一过程往往发生在相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站在相对发达国家的角度研究本国产业向他国转移,二是站在欠发达国家的角度研究本国承接他国转移产业。产业转移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是相对发达国家的跨国集团企业向欠发达国家转移其优势产业的“溢出”模式,另一种是在相对发达国家面临激烈竞争行业的企业向欠发达国家转移其劣势产业的“边际产业转移”模式。具体来看,产业转移理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进步。其主要包含以下观点。

(一) 雁行模式理论

在众多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最具启发性的可能是雁行模式理论。这一模型是由赤松要(Kaname Akamasu)创立、小島清二(Kiyoshi Kojima)发展起来的。它将国际贸易理论中基本的命题资源禀赋理论[又称“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定理]与资本积累理论联系起来,动态地发展了它们的论点。这一理论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发展成为费奥卡瓦拉尼斯^①的经济发展相变理论。

^① 费奥卡瓦拉尼斯(Fei-Ou Kwan)的经济发展相变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s or Transition Theory)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转型阶段的理论。此理论基于经济体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相变”概念,强调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经济结构和行为的剧变。相变理论认为,随着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必然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或“相”。

雁行模式理论包含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与生产和贸易有关的动态、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即进口→国内生产→出口,赤松称之为雁行模式的基本类型。当一个发展中国家试图开始发展时,它不能在国内生产现代商品,因此必须进口。然而,当进口增加,国内需求得到满足时,这些货物的技术就被引进国内,同时也希望进入市场的企业(企业家)就出现了,开始了这些货物的国内生产(Kojima, 2009)。随着国内生产的增加和国内需求的满足,进口开始减少。当生产能力扩大到足以拥有储备时,出口就开始了。换句话说,国家间的比较优势结构在那个时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我们把这种比较优势结构的动态变化称为第一种雁行模式。

第二阶段,比较优势结构发生转变,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或者从消费品向生产性产品过渡。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第一种 FGP 模式(full goods process, 货物从仓库到店铺的全流程管理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开始积累资本,资本变得相对充裕。在这方面,国家逐渐获得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相对比较优势,而资本密集型商品最初没有比较优势。这些货物开始在国内生产,从而影响出口容量。因此,在资本密集型商品方面,也最终呈现出类似第一种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它在劳动密集型商品方面就具有比较劣势,导致后者的生产和出口逐渐减少,最终让位于前者。生产和出口商品的动态结构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代表了第二种雁行模式。

在借鉴东亚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Fei 等人(1986)提出,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现代消费品进口时,会刺激和启动国内生产,导致出现初级进口替代,即国内生产替代进口。随后,初级出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出现,即出口商品从传统产品转向现代消费品。在第三阶段,当生产性商品进口时,国内生产逐步形成,二次进口替代开始出现。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会出现二次出口替代阶段,即出口产品(曾经是消费品)被生产性产品替代。在上述阶段,现代技术完全是从国外引进的。但在第四阶段,技术开始自主发展,二次进口和二次出口替代随着当地新技术的运用而不断发展。这一阶段的转变与第一类和第二类使用进口和出口替代概念的 FGP 理论完全相似。在第三



阶段雁行模式中,当发达国家 A 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优势时,与 A 国有贸易关系的较不发达国家 B 对劳动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较不发达的 B 国追赶 A 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发达的 A 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渐增强,此时比 B 国发展程度更低的 C 国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体现。这种根据各国发展阶段而产生的台球现象,称为第三种雁行模式。通常,亚洲飞雁图案样式的发展过程是指第三种飞雁图案。例如,常被称为雁行模式的产业转移是以日本为领头雁,其次是新兴经济体,然后是东盟,最后是中国后来居上的经济发展的连续过程(Suehiro,2000; Hiratsuka,2003; Suehiro,2000)。这种模式从理论上说是从第一和第二类 FGP 衍生而来的。日本经历了所有这些阶段性的转变,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也经历了这些阶段性的转变,Fei 等人(1986)的研究模型表明第三种雁行模式在这些国家是有效的。

(二) 中心外围论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和马歇尔所说,“中心—边缘”[或核心—外围(core-peripheral)]模型是一种空间隐喻,它描述并试图解释发达或大都市“中心”与欠发达“外围”之间的结构关系(Scott & Marshall,1994)。因此,如果不把一个先进的中心放在与较不先进的外围相当的位置,就不可能确定它是什么。因此,没有外围就没有中心,反之亦然:没有参照中心就没有外围。诞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外围理论,被研究者用来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前者起中心作用,后者作为边缘存在(Prebisch,1962)。然而,由于这一理论的普遍性,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而且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的研究,也适用于地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或外交史的研究。中心—外围论将世界看作一个相互联结并动态变化的体系,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中心”,指具有先发优势的中心国家构成的同质性、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另一部分是“外围”,是指众多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差异化、专业化的经济结构。中心与外围彼此存在着极大的体系差异性。中心国家遵循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模式,这使得中心国家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

的同质性；而因创新带来的技术优势，中心国家在生产领域覆盖面更广，包含在制品、产成品、技术服务等一系列方面，也能够保持多样性。外围国家则截然不同，其发展模式是由加工生产驱动的，经济结构为满足初级制造而将本国资源不断地向生产部门倾斜。因资源分配差异，它的劳动生产率极低与极高的部门并存，经济结构存在异质性。为了满足中心国家的产品生产需要，外围国家不得不不断发展生产能力，并最终使生产部门走向专业化，制成品、技术、服务等只能依赖进口。在 21 世纪深度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心国家的先发优势愈加明显，中心—外围体系的不平等趋势愈发加剧，中心国家不断出现新技术。技术进步使得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产生了体系差异。中心国家占据制成品环节，而随着技术进步，市场垄断优势增强，制成品价格不断上升。但外围国家初级生产品环节却没有因制成品价格的上升而增加，反而在此过程中始终处于价格低位，因此一直被原始不利位置影响。中心国家凭借远超外围国家的技术、资金、人才、物力等优势，制定与操控贸易规则，使得外围国家始终处于结构劣势，处于附属位置，配合中心国家的生产需求，消化中心国家已濒临淘汰的落后技术，并在此夹缝中寻求生存发展的道路。

四、国际区域产业合作的目标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合作要达成的终极目的。企业合作既可以是国际合作，也可以是国内合作；产业合作的目标就是实现双赢，提高产业发展进步水平与产业市场竞争力。企业合作更主要的是遵循丛林法则，也可以说市场竞争规则，产业合作则强调一起发展进步，也就是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

分工和技术化是推进专业技术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针对这个方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早已明确地提出。其中，还要求确定地区分工和地区经济技术化的特点，它是在地区经济综合发展进步的基础上出现的。因而，地区分工和地区经济技术化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地区经济侧重于某一产业，地区产业结构技术化水平高也并非代表着地区产业体系科学合理。



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组合的参考标准是,要有助于地区经济连续稳定发展进步。这就需要思考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具备如下 3 个特点和作用功能:(1)维持或者增强地区的发展潜力;(2)维持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性和体系性;(3)维持地区产业结构的改革创新性。

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组合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是产生了地区创新投资应用系统。地区创新投资应用系统,指的是在一定经济地区内与改革创新全流程有关的组织、组织机构和完成基本条件所构成的互联网系统及其运行工作基本规律,由主体、环境与链接三部分组成,具备自动输出专业技术知识、物质产品与收益三类功能。专业核心知识、企业老板与创业人员、中心产业、各级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环境是建设产业聚集地区创新投资应用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专业核心知识是产业聚集获得长期发展进步的根本,适宜的环境是专业技术改革创新可以全面推进的充分保障,产业发展进步使改革创新可以完成商业化,成为取得经济收益的中间载体。企业老板与创业人员是改革创新的实行者与组织方,各级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是体制改革创新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管理政策、改革创新环境的重要建设者。

从地区改革创新的层面分析,地区产业结构的科学性须从两个方面来考核:首先,认可和接受全球各个国家相对独立的经济收益,从地区发展进步角度来确定产业结构的科学性;其次,从地区层次协调管理国家之间利益和地区分工的相互关系,从追求地区经济总体利益最大角度确定地区产业结构的科学性。

五、区域产业合作的类型和机制

(一) 区域产业合作的类型

区域产业合作可以根据合作内容,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第一,以三大产业本身作为重要基础的相互合作,能够区别以第一产业为核心的合作、以第二产业为核心的合作与以第三产业为核心的合作,与此

同时,也包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全面合作。产业合作是经济合作的基础,其方式也与整个经济合作的水平相联系。欧洲逐渐发展到了经济全面系统化发展的水平,其产业合作自然是全面的。美国、加拿大等自由市场贸易区,以美国与加拿大为核心,非常发达,第一产业所占比例非常小。在这些地区,产业合作主要发生在第二产业。我国与东盟很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三大产业不发达,合作意愿更强,但要采取先后有别、有条理发展的方式。

第二,依据产业合作的密切程度,能够将其区分为疏散型产业合作、密切型产业合作与系统型产业合作。分析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的产业合作,大概可以称之为一类疏散型产业合作。密切型与系统型的产业合作能够被称为体制型的产业合作。欧洲的产业合作早已完成了系统化,美国、加拿大等自由市场贸易区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都应该属于紧密型的产业合作。

第三,以产业合作的联系体制为区分标准,也就是以市场贸易或者投资为基础还是以金融为重要基础来区分,可以将其划分为市场贸易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投资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与金融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截至目前,全球范围的产业合作依然以市场贸易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投资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有了大规模发展,90年代以来,金融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有了一定进步。从地区产业合作角度来说,欧洲早已进入金融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时期;美国、加拿大等自由市场贸易区是市场贸易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与投资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同样重要的时期;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其他地区社会经济管理组织相比较,依然处于市场贸易主导的负责型产业合作时期。

第四,依据交易市场与政府管理部门在产业合作里的影响不同,可以把产业合作区分为交易市场引领型产业合作与政府管理部门主导型产业合作。前者是在交易市场体制中自发产生的,也就是在一定地区内,随着国家与公司联系的持续加强,把上述国家的产业自然链接在一起,形成地区产业结构,欧洲自由贸易区就属于这类方式。政府管理部门主导型产业合作是指地区内的各个国家,依据全球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实际情况,积极主动



采取措施加强产业合作。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普遍属于这类方式。不管是交易市场引领型,还是政府管理部门主导型产业合作,它们都不是完全孤立的。任何产业合作都要受到国家政府部门与国内交易市场竞争两个层面的影响。

第五,以参与产业合作的国家的发展水平差异进行区分,能够将其划分为垂直方向型产业合作与水平方向型产业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产业合作主要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方向型合作,以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方向型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合作在全球各个国家间变得普遍,不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展合作,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也越来越多地以混合型的方式出现,也就是不仅有垂直方向型合作,也存在水平方向型合作。

最初的产业合作,通常是一类松散型、公司与交易市场引领的市场贸易型合作,是一类自发型的合作。

(二) 区域产业合作的机制

地区产业合作的重要体制,是指交易市场体制与政府管理部门体制。交易市场体制又主要包含全球市场贸易体制、全球资金流动体制、全球金融体制、专业技术和数据信息的跨国转化和自动传递体制等。

所谓全球市场贸易体制,是指通过各国与地区之间的连接,形成的全球市场贸易的基本框架,同时也是构成全球经济和产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迅速增长,全球市场贸易的快速扩展成为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全球市场贸易不仅在推动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成为促进相互依存与协作的关键枢纽,逐渐发展为巩固全球分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应对结构性变化的原始推动力之一。全球市场贸易的传递体制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分布空间,将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相互链接,形成整体性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全球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不仅更加紧密依存,也互相制约。

所谓全球资金流动体制,通常指通过直接投资,尤其是欧美投资者将资金、专业技术、数据、综合管理经验、交易市场的销售实践经验等资源带入其

他国家。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将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保留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进而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发达国家更好地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还为新兴技术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推动产业的持续升级。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的影响通常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首先,间接渠道。通过海外资本的流入,促进生产加工资源及基本要素的流动,从而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和使用要求,推动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其次,直接渠道。直接投资不仅在东道国建立新的产业部门,还创造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推动当地产品结构的优化、公司专业技术的提升,并加强产业、公司与全球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产业结构的市场竞争力。

所谓全球金融体制,指的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全球金融市场作为各国之间和全球区域间经济交往的核心枢纽。社会经济管理活动由两个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构成,即价值运动与实物运动。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与进步,国家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上保持价值流量与实物运输量的平衡,同时还需确保价值储备总量与实物储备总量的平衡。金融经济服务体系通过调节价值运动的流量与储存总量,进而影响实物运动的流量与储存总量,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通常来说,金融经济服务体系通过诸如贷款利率等资金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金、人力等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从而影响产业结构。与市场贸易不同,全球金融体制的传递机制并非通过国家对外开放职能部门直接传递到非对外开放部门,而是通过金融渠道在全球范围内传递,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球金融体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不同国家间贷款利率的差异,二是汇率的波动。

所谓专业技术和数据信息的跨国转化和自动传递体制,指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中,专业技术和数据信息作为生产加工基本要素发挥着日渐关键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全球性热潮的推进下,专业技术和数据信息的跨国转化



和自动传递也在持续加强。从国家经济角度分析,认可和接受外来专业技术和数据信息不单单是参加全球分工、开展全球竞争的必要方式,而且是本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的基本条件。从全世界经济角度分析,专业技术和数据信息的跨国转化和自动传递,逐渐发展成为交流沟通与链接全球各个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推动其互动、演变和进化的主要环节,变成一类关键的关联传递体制。当前,信息早已实现了全球共享。数据信息的全球自动传递,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个必要保障条件与直接链接全球各个国家社会经济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发展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互相依存。获取全球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数据信息、全球交易市场数据信息、全球科学技术数据信息,以及与经济相关的数据信息,不管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还是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都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与组成结构改变,是另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与组成结构变化的外界环境影响因素,相反亦然。从数据信息的跨国自动传递在全球地区间产业结构互动中发挥的传递作用角度分析,第一,数据信息是交流沟通与链接全球各个国家,甚至地区间产业结构的主要链条;第二,全球各个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互动、演变、进化,是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全球分工结构的实时改变,同时也是全球各个国家产业结构实时变化的最终结果,二者互为因果。

全球市场贸易体制、全球资金流动体制、全球金融体制、专业技术和数据信息的跨国转化和自动传递体制,主要是国际大型企业在发挥作用。国际大型企业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加工,掌握了全世界 70% 的直接对外投资、三分之二的全球市场贸易、70% 的专利与其他专业技术转化。现代国际大型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快速、空前地发展进步,其投资已遍布全球每一个地区,渗入各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每一个产业职能部门与公司内部,逐渐发展成为链接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产业结构的主要力量。换句话说,国际大型企业是全球与地区产业合作的主体。它通常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全球市场贸易、全球直接投资等体制的多层面影响与作用;其次,对全球分工的深刻影响;最后,运营管理商务活动的全球性与地区化。

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在国际大型企业的生产加工技术受全球分工的影响下,国际大型企业成为全球产业转型的关键角色。这些企业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决定产业转型和布局。从全球视角来看,产业分工系统已经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分布层次。首先,美国、日本、欧洲等拥有最多国际大型企业的国家位于全球分工系统的上层,其产业结构朝着高度专业化、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其次,少数通过大型国际企业直接投资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位于中层,它们主要生产低技术、资金密集、专业知识和劳动相结合的产品。最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分工系统的底层,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与大型国际企业及第二层次国家的企业合作,生产一些将专业知识、专业技术与劳动密集型特点结合的产品。

大型国际企业主导负责的交易市场体制,是全球产业合作的重要体制。但是,和通常意义上的全球产业合作不同,在地区产业合作中,政府管理部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三) 产业集聚

产业之所以会集聚,是因为产业集聚可以给集聚在本区域的企业带来知识外溢、资源共享等一系列优势,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发挥本区域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Porter(1998)指出,在一个竞争主要由投入成本驱动的时代,拥有一些重要禀赋的地区,例如天然港口或廉价劳动力供应,往往享有一种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持续下去。

Marshall(1920)提出,人员和货物的运输、各相关企业人员间的交流都需要一定的成本,而产业集聚可以降低这些成本。首先,如果企业设立在供应商或客户附近,可以大幅降低货物的运输成本。其次,把企业设立在劳动力汇集的地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附近,有利于减少成本。最后,他提出了知识溢出理论,认为应把企业建立在城市群中。Fujita 和 Anthony 等人(1999)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概念,认为降低运输成本是产业集聚的核心驱动力。梁琦(2004)认为,任何新知识和新技术无论在全球哪个地方诞生,虽然中间



会产生种种不利的因素,但它们最终会流向全世界的各个区域。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并不具备即时性和瞬时性,在有限的时间内,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也是有限的。而且,随着知识和技术传播路径的不断变长,传播时对信息的扭曲和失真的现象就会越多。Jaffe 和 Trajtenberg(1998)、Eaton 和 Kortum(1996)对区域专利引用数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区域内的知识和技术扩散程度要远高于区域外的扩散程度。Gleen 和 William(2010)通过检验 Marshall(1920)的产业集聚理论认为,产业集聚的好处会最终体现在邻近性导致的运输成本降低所产生的收益上。

在知识溢出效应上,高技术产业的集聚有利于人员打破地理隔阂,方便进行技术交流,加速了企业间信息和新技术的传播,整个产业集群的整体效率能够得到提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会有利于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市场共享,最终传导至产业集聚(王立平,李缓,2021)。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构建和完善数据的互联互通网络,促进企业与个人间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打破“信息孤岛”,减少组织间信息的隔阂。而且,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自动化生产代替人力劳动,解放大量的劳动力,使这些劳动力可以从事更具有创新性的工作。Henderson 和 Vernon(2003)发现,本地自有行业的规模外部性可以通过本地其他自有行业工厂的数量来衡量。产业集聚在高科技行业中有很强生产率效应,但这种效应却不存在于机械制造等行业中。Glaeser 和 Edward(1992)通过研究美国特定时期的制造业状况,认为在城市—工业层面,竞争更有利于产业的发展。跨行业的产业集聚、城市多样性更有助于就业增长。他们对这一结论的最佳解释是,行业内知识溢出对增长的重要性低于行业间溢出,特别是在相当成熟的城市。有证据表明,不同行业之间的思想交流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城市的发展是这种现象的一种表现,例如,这一结果将意味着在开放的社会中,劳动力在各个行业之间的大量流动,将展现出更多的思想传播和经济增长。思想交叉传播的观点支持劳动力流动,如移民和跨地区迁移,这有利于产业的发展。

Jacobs(1961,1969)认为,城市扩展的动力来自城市内各产业的跨行业集聚,不同产业间的差异性以及多样性通过交流和碰撞会产生技术溢出和知识

传播。各种类别的产业都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以及关联性。多样化聚集有利于各产业间的不断互动,各个不同领域的人才、技术和信息得以不断交流与融合。这些人才、技术和信息在不断的交流和碰撞中会产生“相互孕育”的效果,最终加速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非传统制造领域,高技术产业和不同类别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地融合,能够通过多样化的信息和技术产生多种交叉领域的新产品和服务,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而且,多样化集聚还有利于强化产业间的精细分工,促进区域内厂商的竞争,提升区域内的产业创新能力,最终提升区域的产业竞争力。

韩峰和阳立高(2020)认为,作为上游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规模效益和技术外溢效应等机制推进产业分工,延长价值链,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Marshall(1890,1961)认为,集聚经济外部性会在产业的区域内集中分布,以及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会产生两种效应:第一种是规模经济效应,第二种是技术外溢效应。一方面,专业化集聚有利于克服地理上的以往企业空间距离较远的缺陷,节省了包括运输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专业化集聚有利于具有相似技术特点的企业人员交流信息及技术。这种交流包括正式的以及非正式的,从而打破组织间的信息鸿沟,促进信息的流通,最终促进产业整体生产力以及竞争力的提升。

帅彦竹、朱鹏洲(2020)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形成一种本土化的生产网络,将各个生产单元高效地聚合在一起,促进各种要素在组织间自由流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打破信息壁垒。在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更多且实力更强的公司会被吸引到这一区域,这使得竞争更加激烈。弱小的公司在面对更大市场、更激烈的竞争时往往很难生存,最终优胜劣汰,这一区域产业的竞争力会整体增强(Combes & Duranton,2012)。苏丹妮等(2020)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只有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才能承担较大的生产成本,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Baldwin & Harrigan,2011)。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行业的技术较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产品质量较差,无法达到一定的标准,从而不利于出口。当产业得到升级,出口产品质



量得到大幅提升时,这种缺陷就能够得到弥补,从而利于出口。陆毅和李冬娅(2010)对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聚现象会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与众多的中小型公司相邻并不会使自身受益,临近大型公司的企业更有可能从中获益。Holmes 和 Stevens (2002) 分析了美国的制造业数据,发现无论在产业内部还是不同产业之间,产业集聚都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Barrios 等(2006)对爱尔兰的制造业数据进行了分析和检验,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Lafourcade 和 Mion(2007)对意大利的制造业数据进行了分析,也认为产业集聚现象对企业规模的扩大有正面影响。傅十和与洪俊杰(2008)研究了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的关系,发现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效应会正面影响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大中型城市的马歇尔外部经济特征更为显著,特大和超大型城市的雅各布斯外部经济特征更为显著。Baldwin 和 Harrigan(2011)认为,大量的产业集聚在某一区域有利于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文东伟和冼国明(2014)也认为,中国制造业有不断向广东、浙江、福建等几个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集聚的趋势,这些高度聚集的行业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时,这些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信息、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也会愈发频繁,国际市场上很多已经经过市场实践检验的技术和经验也会一起流到出口企业中。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也有利于企业发挥规模效应。因此,产业集聚有利于出口,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品质量的提升。

(四) 区域外部分工

产业分工是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细分领域之一,很多学者对该理论做了翔实的研究,推动产业分工理论不断发展。亚当·斯密(1776)最早在其著作《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分工的概念,此后又出现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流派。学者们在研究产业分工的同时往往也会涉及国际贸易的领域。亚当·斯密(1776)提出了绝对优势的概念,各区域会根据自己的绝对优势发展相应的产业,生产相应的产品,从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然后通过本区域优势产业的产品参

与国际自由贸易。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分工,是分工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虽然绝对优势理论指出分工对于生产力提升的重大意义,但该理论仅适用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已经开始工业化进程并向全世界出口产品的国家,无法解释各个经济部门都弱于另一国家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 and 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的贸易。基于以上的这些缺陷,Ricardo(1817)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即便相较于其他国家不存在绝对优势,仍然可以利用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在很长时期都是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基本能够解释绝大多数国家从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各不相同的状况。但是,比较优势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该理论没有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是怎么产生的。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各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是一成不变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情况并不会出现,这很难解释在旧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长为工业国的现实,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基于 Heckscher 模型,Ohlin(1933)提出了要素禀赋的概念,进而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会使用本国充裕的要素生产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这些产品,不充裕要素的情况则反之。Samuelson(1948)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最终会导致各国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但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也认为各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是一成不变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情况并不会出现。

但是,近几十年的现实情况是,产业升级是会发生的。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全球化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发挥自己劳动、土地等要素价格相较于发达国家偏低的优势,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落后产业。但是,这里的“落后”指的是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而相较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产业,这些产业是“先进”的。虽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人才、资本、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但发展中国家也会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积累自己的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优势。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的



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发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这些理论都广泛地使用了静态分析方法。在现实中,国际产业分工的变化往往非静态,而是动态的。为了克服以往理论中的缺陷,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研究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和贸易关系,形成了新贸易理论。构成新贸易理论比较典型的文献有 Grubel 和 Lloyd(1975)提出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该理论放宽了以往国际贸易理论中一些严格的假定,如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规模收益不变等,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等方面考察了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贸易的形成机制,进而解释了当时产业内贸易份额权重在国际贸易总体份额中不断增多的现象。以 Vernon(1966)为代表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产业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产业的成长过程是动态的。一个区域的产业从出生开始就注定在一定时间内,它最终会由于种种原因完全退出原来的区域,转移至更加适宜这个产业发展的区域。这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创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在这之后,这些衰退产业会进行战略转移,由其他较落后的国家承接。以 Gereffi(2002)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由跨国企业构建的网络组织会涉及原料采购、半成品加工和成品制造、产品消费和回收处理等从生产、消费到回收几乎所有的环节。参与价值链上各分工环节、增值活动以及利润分配的企业散布于全球的各个区域。相对于以前的研究,新贸易理论扩展了要素的范围,克服以往理论仅限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缺陷,研究对象不仅限于产业间分工,还拓展到了产业内分工。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把分工、贸易和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割裂开来,新贸易理论把这些因素整合到了一起进行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水平决定了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

上面着重回顾了产业分工的理论发展脉络,也有大量的学者针对观察到的具体状况做了详细的研究。梁琦(2004)计算了我国区域制造业分工指数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变化率,认为产业地方化、地方专业化是一个趋势,产业分工与地理距离有很强的关系,地理距离越短,产业同构性就越强,地理距离越长,产业互补性就越强。殷醒民(2006)分析了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的制造业

分工地位,认为在区域内部并不会形成“产业同构”现象,区域内各地的产业分工会不断加深。孟德友和陆玉麒(2012)对我国中部数省,如湖北、河南等省的制造业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区域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产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存在差异。吕卫国和陈雯(2013)研究了江苏省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的关联,认为在不同时期,各类地区的专业化分工状况会有所不同。当区域间产业一体化程度较低时,各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处于数种状态并存的复杂局面。当区域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产业将初步向具有优势的地区集聚。当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集聚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会促使制造业由集聚中心向外围迁移。李学鑫和苗长虹(2006)对中原城市群的区域产业结构做了量化分析,认为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会促进城市群的发展,从而带来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和协作的不断深化。姜晓丽、张平宇和郭文炯(2014)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发展程度不一的产业中,产业分工的深度存在巨大的不一致性。毛艳华(2005)认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会加快经济全球化步伐,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这会促进国内各区域间的产业分工程度加深。李娜(2009)认为产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产业分工虽然主要由市场主导,但也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引导。政府引导有利于避免产业分工过程中出现的企业盲目投资等一系列缺陷。姜晓丽、张平宇、郭文炯(2005)认为,深化产业分工是为了发挥各区域的资源禀赋,突出比较优势,避免过度同类竞争,促进高效率区域分工合作体系的构建。李娜(2008)认为参与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有利于参与者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协作的过程中,人员、技术、信息等要素会不断地交流,伴随而来的就是技术转移,从而利于区域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王婷和芦岩(2010)认为发达国家把各方面已经不占据比较优势的落后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过程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来实现的。这个过程促进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细化和深化。关于产业分工的重要影响因素,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梁琦(2005)认为,产业分工的格局从根本上取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区域的生产力决定了本区域承担的生产环节。经济发展程度越相似的地区,其产业分工程度越弱,而不同



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差距越大,其产业分工程度就会越强。陈永国(2007)基于技术转移的视角,认为来自科技领先区域的高新技术会转移至科技较落后的地区,与当地的制造业相结合,从而形成产业互补格局,提升经济效益。毛艳华(2005)认为在自然条件、资本充裕程度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区域产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基于各区域之间生产要素的互补性,产业分工有利于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突破瓶颈要素,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使参与产业分工的各区域经济得到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是产业集聚还是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它们都可能是通过市场、政府或跨国企业等途径实现的。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了产业集聚或区域间的产业分工,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发挥区域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促进企业与个人间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打破“信息孤岛”,减少组织间信息的隔阂,有效地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同时,区域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又会进一步促使区域间或区域内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化。这种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分工深化与促进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各区域选择自己相较于其他地区的优势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并进行专业化生产,通过区域之间的产品交换行为实现并增加产品价值,满足本区域的生产以及生活需要。因此,无论是区域内还是区域外的产业分工,它们都是各个区域内或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及相互协调的过程。

第三节 产业合作与效益的方法论体系

本书采用的方法考虑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既从历史视角探讨国际区域产业合作的实践,又从定量分析角度,采用模型和数据实证分析产业合作的机制、因果关系和合作效益等。

一、博弈论

博弈论的理论思想发展历史非常悠久。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田忌赛马”这一典故就是博弈论的体现,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具有策略依存特点问题的决策智慧;在当代,“囚徒困境”又将博弈论这一历经千年的智慧带进了科学范式研究中。1950年,纳什引入“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概念,演化并推导出纳什定理。这一创举奠定了博弈论中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础,将古老的博弈论转变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与范式。随后,博弈论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研究当中,成为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考虑到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关系受到双方博弈机制的影响,因此建立博弈模型来探讨这一合作机制是十分有意义的。当前,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创新等领域的影响力较强,自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美国围绕“重返亚太战略”在亚太地区持续布局,尤其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频繁对中国施压,并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对东盟国家发力。这表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并在不断深化其影响力。因此,将中国、美国和东盟国家纳入三方博弈模型中进行分析,可能更贴近中国、东盟国家的产业合作机制现实。

二、因果分析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最早由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于1926年提出。从20世纪40年代起,计量经济学逐渐发展并成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它不仅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是现代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研究范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所言:“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管理学科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计量经济学实验模型的一个主要用途是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探讨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关系时,首先需要分析相关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由于经济学中的变量之间常常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有时这些关系是双向的。如果未能准确厘清这些关系,可能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进而得出反向因果的结论。例如,国民收入总值的增加通常对国民消费产生正向影响,但与此同时,国民消费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国民收入总值。因此,明确时间维度对于厘清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分析这些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格兰杰(Granger)提出了一种经典的检测方法,称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test of causality)。该方法通过引入时间序列数据,帮助研究者识别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进一步区分变量之间的单向因果影响和双向反馈效应。

三、投入产出

从理论上来看,最初在 1874 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éon Walras)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了“瓦尔拉斯均衡定理”。该定理假设市场中存在 m 种消费类产品和 n 种基本生产要素(如劳务),每种产品和要素都有市场交易数量及其相应的市场价格。此外,还涉及 mn 种专业技术参数。根据该假设,系统中的未知变化量共有 $2m + 2n + mn$ 个。在这种情况下,假设选择其中一种产品作为参考标准产品,且该产品的市场价格被定为 1,那么其他产品的市场价格则会相对地由参考产品的价格来表示。此时,未知变化量的数量将减少为 $2m + 2n + mn - 1$,即在参考标准产品价格为 1 的约束下,未知变化量的数量减少了一个。在这一情境下,瓦尔拉斯发现,系统中的独立方程式数量恰好与未知变化量的数量相等,从而实现了市场的均衡状态。这一理论为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奠定了基础,并为市场交易和价格形成提供了数学化的描述。

在此基础上,列昂惕夫提出了投入产出分析的经济原理。列昂惕夫通过

提出投入产出模型并编制了美国 1919—1929 年度的投入产出表^{①②},为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框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采购了五万架军用飞机。在生产过程中,军工部门仅关注了铝材的消耗,而忽视了制造飞机所需的铜材,导致铜材严重短缺。铜材广泛应用于电线等输电设备的生产,缺乏铜材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迫使政府寻找替代材料来弥补这一缺口。此后,军工部门汲取了这一经验教训,认识到仅仅满足新武器装备的生产需求并不足够,还需科学的综合管理模式来规划生产、调配资源和协调各部门之间的配合。1944 年,在列昂惕夫的指导下,美国劳动统计分析局编制了美国 1939 年经济投入产出表,该表包含了 96 个生产部门,并受到了美国军事职能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高度重视。此外,美国劳动统计分析局还利用这一投入产出表估算了如果二战于 1945 年 6 月 30 日结束,美国到年底的就业情况。^③

从实践角度看,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要求政府部门有系统地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24 年,苏联中央统计局根据政府的指导方针,编制了 1923—1924 年度的国民经济平衡表。该平衡表包含多种类型的价值平衡表,例如社会市场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平衡表、国民经济收入平衡表、各职能部门间的产品生产与分配平衡表等,同时也包括实物平衡表。上述表格里指出了以平衡表的方式,分析研究国民经济每一个职能部门与多种主要产品生产加工和损耗之间的平衡问题。^④

投入产出分析所具有的突出特征,可以表现国民经济中各个职能部门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通过直接与完全消耗系数来衡量国民经济中部门间所存在的生产要素使用与分配的情况。

① Leontief W. The Balance of the Economic Balance of USSR[A]. In Foundations of the Soviet Strategy for Economic Growth: Selected Soviet Essays[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88-94.

② Leontief W.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conom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9—1929.

③ Princeton University. Appendix B—Conservation in World War II: 1933-45[M]. Princeton, 1979.

④ Popov P. I. The Balan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SSR, 1923-24 [M]. Moscow: Central Statisti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USSR, 1926.